

清朝乾嘉时期的金石大家

□ 李秀潭

春夜，灯下伏案品鉴旧藏碑帖。有一册阮元藏唐《温彦博碑》（习称《虞恭公碑》）明拓本。此拓本经拆装，楠木夹版。封面阮元题签《温虞恭公碑》，扉页钐“臣阮元印”“芸台”印鉴，内页有明东林党首领陈于建之孙清康熙诗人陈维崧“湖海楼收藏印”等。拓本碑文损伤自然，神韵犹存，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和年代感。

此碑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立。碑文系初唐书法四家之一的欧阳询（另三家是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书，是欧已知最晚作品。此碑与《九成宫》等其他欧书碑版相较，用笔结体更为瘦峭险峻，锋颖毕露，文华渊穆，体现了欧体楷书的不同审美意趣及翰墨风范。

阮元对金石学的贡献

阮元，号芸台。清朝一代大儒。他身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活跃于政界、学界、文坛达半个世纪，被人誉为“一代经师，学界山斗”“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尤其是他作为学者型官员，一生致力于金石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对金石之学卓有建树，不愧为乾嘉盛世的金石大家。

探讨古代文化，不仅须读书，而且须研古物。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标志。而金文和石刻，更是古人思想的记录，是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的第一手资料。国人对于古物的研究，远在西洋考古学之前，即有所谓金石之学产生。金者，指商周青铜礼器、兵器、钱币、玺印、镜鉴等吉金器物；石者，指秦汉以来的碑碣、墓志、造像、佛教的摩崖石刻，兼及玉器、砖瓦、甲骨、简牍等。金石文字，可用来参证历史史实，补正史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等是古文字学及古史学重要研究资料。宋以后，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和研究金石文字图像渐成风尚，始产生金石之学。如曾巩《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品大临《考古图录》、赵明成《金石录》等。由宋至清，虽然搜集与研究金石者不少，但大部分古物是在权贵或古董商手中，摩挲玩抗，未

作学术研究之用。而文人学士，也大都赏鉴金石文字的艺术，临池篆刻，使金石成为书画附属品而已。直至清初百余年间，兵燹消弭，海内渐定，而文网甚严，承学之士相率遁于金石学之途。且其时金石器物之出于丘陇窟穴者，更十数倍于往昔。由此，学人广泛搜考金石文字，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释其文者，有评其书者，有述其史者，著作如林，名家辈出，金石之学遂蔚为显学。

阮元生活的时代，适逢乾嘉学派形成发展的黄金时期。他英年早达，兼享大年，二十六岁即入仕途，为官五十载，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进京任大学士宰相。历官所至，他十分注重对金石文字的搜访、编印和研究。乾隆五十八年，阮元任山东学政，首谒孔子故乡曲阜阙里，观看乾隆钦颁周器及鼎、币、戈诸古金，又摩挲了两汉石刻。再登岱山，观唐摩崖碑题名。又到济南府学，观戟门诸碑及汉祠石像。遂后，他公事之暇，咨访耆旧，博稽群籍，征集碑刻拓印，编刻《山东石志》二十四卷。赴任杭州后，在卷帙之余，遍游两浙名山大川，搜访摹拓金石遗文，足迹穷尽幽远偏僻之处。共得金石数千种，编为《两浙金石志》十八卷。阮元认为，钟鼎铭文，虽其寿特永，经久不变，但易散失，不如刻板图书流传广泛久远。因此，他不满足于钟鼎彝器一时收藏，而向四方友人、同好广为征集钟鼎彝器及拓本，加上自藏自拓者，编刻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编录自商周至晋代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并撰释文，于嘉庆十年自刊行世，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元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述，开创了集诸家器物为专集之先河，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用吉金铭文和碑刻文字来研究历史、用实物校勘古书和考证古制的新途径。

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地位高，寿命长，影响大，对金石

之学贡献颇丰。他在《研经室三集·金石十事记》中，对其一生致力金石之学活动进行了回顾总结。“客有问于余曰：‘予于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数指而证之，有十事焉。余袁山左金石数千种，勒为《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袁两浙金石数千种，勒为《两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积古金拓本五百余种，勒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事之三也。扬州周散氏大盘，东南重宝也。岁丁卯，饬使者献于朝。余模铸二盘，极肖之。一藏府学，一藏文选楼，事之四也。天一阁北京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扬州甘泉山，得西汉中殿第廿八二石于厉王家。天下西汉石，只此与曲阜五凤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书佐至诸城琅邪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汉府门之倬大石人二仆于野，为樵牧所残，余连车运至曲阜鲁榘相圃中并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于金石为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尚愿增其事焉。’”

乾嘉时期金石之学兴起的原因

金石之学，肇于汉，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为何复兴于清？究其缘由，列举荦荦大端，一是外部严酷政治环境使然，二是内部学术发展规律使然。清代前期，入关之初，清政权尚未稳固，需笼络人心，对汉族士人不得不采取宽松的怀柔利用政策。顺治十一年后，清政权逐步稳定，文化政策开始严厉起来。特别是雍正康熙末年激烈的储位之争中取得胜利后，欲立威以自固，由康熙朝怀柔宽松转变为严厉的高压政策。除了屠杀兄弟、诛戮大臣外，又匠心独运，多次罗织文字狱，借以威慑士人，统驭万民。乾隆继位后，文网之严密更胜乃父，开展大规模旷日持久的禁书、烧书运动。凡是有民主和民族色彩的著作，一概禁售、毁版、

焚烧。著者及其子孙，皆以“妄谈朝政”悖逆不法罪坐律问斩。广大士子谈文色变，“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士子不敢谈论政治，评论历史，思想僵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乾隆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稽古右文”，倡导文治。大力编纂刊印各种类书、丛书、工具书等，以示提倡经史考据，嘉惠士林。乾隆这种专制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迫使并引诱学者就范，学术界被全部纳入了考据学的轨道。学者为避免文字之祸而不敢多谈时政。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的金石之学，正好适应了学者避世治学的需要。加之乾嘉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则为考据提供了安宁的学术环境和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金石之学得到发展。

清代金石之学的复兴发展，除了外部环境外，还与儒家学术的内部发展规律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金石学是儒家内部一种崇实复古思潮。它是在批判宋明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点的哲学思维形态，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长达七百年之久，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桎梏，在理论上已走到尽头。明清之际，思想家经历了明王朝的衰败与灭亡，从亡国之痛中重新评价儒学和理学，痛诋宋明理学的空疏误国，有志之士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反理学的思潮朝着崇实复古、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但清代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迫使大部分学者离开了经世致用的宗旨，走上了纯考据的道路。金石之学的复兴发展，既是客观政治环境造成的，也是学者反宋明理学，崇汉学实学（广义的汉学，包括历史、音韵、文字、训诂、金石等领域的考据之学。汉学其方法是朴实地考证经史，故又被称为朴学、实学）思潮所决定的。如果没有清代学人内在的积极性，清代金石学就不可能得到如此繁荣发展。

金石学之盛衰轨迹，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国人可从中悟到治学之道、治世之道、治国之道的成败得失。

未已斋札记

（上接1版）《准则》也明确，“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在研究工作时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一抓到底，不得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迅速有效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决策部署是基层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当前，一些基层组织涣散、纪律性不强，一些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落实效率、执行能力不够。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决议》中所谈到的“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要坚决杜绝抓落实“空转”现象，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坚持抓工作不等待、不观望，一项一项抓落实。在实际工作中，要深化对“不冷不热、不急不忙、不疼不痒”等专项整治，向落实工作不积极、面热心冷，谋私逐利、不担当、不作为等行为开刀。通过树立正面典型，问责负面典型，形成正风肃纪的强大震慑作用，进一步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古田会议正是因为发扬了党内民主，汲取了群众智慧，才使得党内错误思想得以纠正，取得了思想上的空前统一。《决议》从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角度，把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具体化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指出“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白军的界限，使红军成为了一支扎根群众的新型人民军队。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脱离群众是动摇根基的最大危险。一些党员干部不闻百姓疾苦、不问群众冷暖，不知民情民意、不晓民忧民怨，不尊重群众意愿、不维护群众权益，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传统相背离。为民、务实、清廉，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反省自身，查找差距，修正错误，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以实际行动和扎实作风取信于民服务人民，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经常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注重纠正错误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经常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注重纠正错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一大法宝。在党内生活中，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终达到思想统一，是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古田会议总结了早期建党的经验，在如何妥善解决党内认识纷争问题上树立了典范。《决议》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为防止斗争走过头，《决议》还规定“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要反对“不要证据乱说，或互相猜忌”。这一系列规定，为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指明了方向，为民主生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反观我们当前的一些党内生活，有些同志在自我批评时，泛泛而谈、轻描淡写，不敢揭露自己深层次存在的问题；在批评他人时，存有“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的思想观念，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沉默不语，要么蜻蜓点水，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锐利武器，必须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敢于直面自身问题，诚心诚意听取批评意见；领导干部和党员要实事求是地相互指出缺点和错误，从而达到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良好局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聚焦问题和不足，注重以事实为依据，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查找原因，真正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

（作者系福建省龙岩市委常委、永定区委书记）

谨防中招人性弱点

魏文侯用人史话（三）

□ 陈家兴



文侯问李克

文侯之子公子魏击出行，途遇国师田子方，连忙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回礼，其虽为国师，看来也是有点傲慢的意思，当时魏击就生气了，怒而问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这一怒，其实只是暗含了意见。不过，田子方说了一段后世闻名之言，大有深意：“亦贫贱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

这一段话，亦可为君主与贤才关系的正解。对于君主来说，如果傲慢以待贤才，则贤才去，必失其国。对于贤才来说，如果其言君主不用，其行不合君主之意，大可以抬腿就走，也没有什么损失，甚至还会为敌国所用。田子方的回敬之语实在让人受不

了，却是贤才士人的风骨，人主决不可轻贱侮慢之。魏击在其父的熏染下倒也非败类，不是回告其父此事而是顿然醒悟，再三作揖感谢指教。

魏文侯的选贤任能，也不是生来就擅长。如上所言，其为雄主，就在于知错能改。比如他任用西门豹的故事。当初，西门豹为邺令时，廉洁奉公，政绩显著，但很轻慢魏文侯的近侍，近侍因此相互勾结中伤他。过了一年，西门豹回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魏文侯反而收回了他的官印。这表明魏文侯也有偏听的毛病。

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地的方法，现在懂了，希望发还官印，让我再去治理邺地。如果治理不好，“请伏斧钺之罪”。魏文侯不忍心拒绝，又把官印交给他。西门豹因而加重搜刮百姓钱财，极力侍奉君主近侍，即所谓“重敛百姓，急事左右”。过了一年，西门豹回去上缴赋

税，汇报政绩，魏文侯亲自迎接，并加礼拜。西门豹回答说：往年我为您治理邺地，而您要收回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侍治理邺地，您反而要礼拜我。我无法治理邺地了。于是交还官印离去。魏文侯不接受官印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尽力为我治理邺地。最后没有接受西门豹的官印。

魏文侯这一偏听，就差点失去一大贤才。今天，又有多少领导干部如魏文侯般，都是通过身边左右的人来了解治下之人？很多人人才就是这样被人查解、中伤，无法改变领导的看法而暗自神伤。

在用人上，面对两个能力差不多的人选，用谁不用谁，体现的是用人价值取向。今天很多领导干部困惑于此，关键原因就在于价值标准没有明确。当年，魏文侯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其臣子李克就促其确立价值标准。李克就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

当时，魏文侯在魏成和翟璜两人中选一个国相，问李克选谁好。李克说：“卑不谋尊，疏不谋戚”，推说不敢妄议。再问，李克便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就此五条足以判断人的高下，不必我来挑明。魏文侯便说，先生请回吧，我的国相选定了。这其实说的也是知人之道，只不过都重在平时观察。是以，古人说知人为千古难事，其实未必。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李克是翟璜推荐的，出来时便遇到了他，翟璜知道文侯召他去征求对国相人选的看法。估计他内心里也会觉得李克应知恩图报而推荐他。李克说他推荐的是魏成，翟璜听了便忿然作色。发牢骚

说：我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还有你李克等，哪点比魏成差？李克说：“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意味你推荐我，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显职吗？这李克真是一针见血，一下子就刺破了翟璜内心里的脓包，估计今人读来也会内心一震。

然后李克说了两人的差别，说魏成享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都用来结交外面的贤士，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英才。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仅此一点，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了很惭愧，表示愿终身拜李克为老师。魏国之贤人也如是。不是说是贤人就都无瑕疵，而是说他们皆能知错后改，知不足而后进。

魏文侯之用吴起，亦显其用人思路乃是用所长，而不求全责备。当初，吴起在鲁国任职，齐国来攻鲁国，鲁国想用吴起为大将，但其妻为齐国人，鲁国便疑忌他。于是，吴起杀妻而求将，大破齐军。有人因此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吴起，吴起知道后怕治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便投奔他。文侯征求李克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然而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是比不上的。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连克五城。

战国时期，各国争相求才，对人才求全责备，因其小过而弃其大用，往往就会让人才流失。不过，各国君主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千百年来，亦多有如此。唯有那些用人所长、视大用而不拘其小过者，方能把

各类人才网罗门下。比如公元前377年，子思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说：他的才能足以统帅五百辆战车的军队。卫侯说：我也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它。卫侯是典型的用圣贤的标准来要求人才的。

子思说：“夫圣人之官人（选人任官），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合抱巨木）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子思讲的道理可谓深刻，在战国这样纷争之世，正要收罗英武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大将，这要让邻国知道，岂不大喜？卫侯尚能听其言，而鲁国国君不能用吴起，以致魏国得才，岂非愚昧？

可惜，山东六国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君主不多。公元前387年魏文侯一去世，太子魏击即位为魏武侯，吴起便被人设计陷害，使魏武侯对吴起产生疑忌，吴起怕有杀身之祸，便投奔楚国，楚悼王即任命吴起为国相，短短数年楚国便迅速强大，“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由此可见失一大才，为国之患；得一大才，为国之幸。

不过，吴起的改革触动楚国王亲贵戚、权臣显要们的利益，楚悼王于公元前381年一死，吴起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即便伏在楚悼王尸体上面，也被贵族国戚和大臣作乱而起的暴徒们乱箭射死。